



左图:定陶战役要图
上图:2016年9月,为纪念定陶战役胜利70周年,山东省菏泽市定陶区人民政府在定陶区革命烈士陵园内增设石书,以纪念先烈

百战奇略

信问通,则心有所恐,亲戚往来,则心有所恋

白衣渡江与太原战役

章明许正

原典

《百战奇略》书战篇原文为:凡与敌对垒,不可令军士通家书,亲戚往来,恐言语不一,众心疑惑。法(出处不详)曰:“信问通,则心有所恐;亲戚往来,则心有所恋。”

书战篇大致内容为,与敌对峙时,应严禁官兵同家人通信往来,防止因信中说法不一而导致军心动摇、思想疑惑。诚如兵法所说:“与家人通信,容易让士兵产生畏敌怯战心理;与亲戚往来,容易让士兵因思乡而产生厌战情绪。”

战例

汉献帝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关羽屯兵江陵(今湖北省荆州市荆州城)。东吴将领吕蒙趁关羽后方空虚,带领部下扮作商人“白衣渡江”,偷袭并占领公安(今湖北省公安县)、南郡(今湖北省荆州市江陵县)。占据两城后,吕蒙明令禁止士兵侵扰百姓,对百姓加以慰问和救济。吕蒙还着重优待关羽军中将士的亲属,并允许他们同关羽军中将士通信,以达到劝降的效果。这极大地瓦解了蜀军斗志,使关羽部众军心涣散。

1948年10月5日至1949年4月24日,徐向前指挥所部华北军区第一兵团等部队共8万余人,对国民党军太原绥靖公署下辖部队10万余人发起攻击。战役期间,中央军委出于战略全局需要,电令缓攻太原。于是我军在包围太原城的基础上,对敌展开政治攻势,有效削弱敌方兵力,着力瓦解敌方意志,最终确保了太原的胜利解放。

计谋分析

防敌攻心。书战旨在阐明,战时应禁止将士与亲友通信往来,以防止敌方利用己方书信进行策反或窃密。“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一封战时家书,无论对身处战场的将士,还是对远在后方的亲人,都具有极重的分量。需要认清的是,战时家书对军心士气具有利弊两面作用。有利的一面是,战时家书能够打消将士对远方亲人的牵挂,坚定奋勇克敌、胜利凯旋的信念;不利的一面是,战时家书如未得到有效管控,被敌方截获或利用,不仅会造成泄密问题,还可能对临战将士的战斗意志产生负面影响,造成军心动荡、士气衰微。在公安、南郡两城被吕蒙所占后,关羽带兵回击。在行军途中,他没有及时断绝部属同城中亲人的书信往来。部属在得知家人相安无事、待遇优渥之后,无心再战,纷纷主动投降。

灵活运用。实行书战切忌教条僵化,而应当依据实际情况灵活运用,合理处理官兵战时家书的两面性。战时,既不能对官兵家书疏于管控,也不能一味禁止官兵同亲属的通信往来,而应根据战场形势的发展变化情况,对官兵战时通信往来的内容、时机、方式等进行合理限制。在敌情威胁严重、作战任务保密要求高等情况下,应当及时切断官兵通信往来,确保作战任务顺利完成。在战场态势于我有利、战时政治工作需要等情况下,可以适时放开官兵通信往来,为激昂己方斗志和加速瓦解敌方提供助力。

主动攻心。书战之法,也可理解为心理战的一种具体方法。在运用该战法时,可将之纳入对敌心理战的总体规划之中通盘考量,一方面确保防敌攻心,另一方面则可以彼之道还施彼身,力求对敌攻心夺志。正所谓“最好的防御是进攻”,与其被动防范敌方利用己方书信,不如主动利用敌方通信。吕蒙优待蜀军亲属的目的,正是为了拉拢他们成为自己的说客,让他们亲笔写信策反蜀军将士。反向应用书战之法,可以将巧借

书信劝降与俘虏临阵喊话、散布虚假信息、传播文宣制品等心理战方法相结合,以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我军包围太原城后,对敌展开强大的政治战与心理战攻势。一方面,在政治上感化敌方亲友,发动他们以书信劝降的方式瓦解敌方斗志,让他们成为我军的“劝降参谋”与“策反顾问”。另一方面,通过散发宣传、阵前喊话、善待与释放俘虏等方法感化敌人、瓦解敌军。在这样的双重攻势下,敌军大量人员起义投诚。

太原战役中,我军在夺取城外要点、包围太原城之后,便逐步放开官兵通信往来,让官兵“利用老乡关系”争取敌军人员起义投诚。尤其是“大胆地使用高级俘虏与大量派遣俘虏”,让他们通过书信带话、阵前喊话等方式瓦解敌军,这对太原战役的最终胜利,起到了很大作用。据统计,我军在太原战役期间,以伤亡3531人的代价,达成了“毙伤俘敌加投诚之敌共计11765名”的战果。其中,“仅经过我们收容、登记过的,向我投诚与逃跑过来的敌军官兵即达7625人”。可以说,适时放开官兵通信往来,对敌开展政治攻势并积极瓦解敌军,是“打太原的主要法宝之一”。

示弱于敌 重点围歼 扭转局面的定陶战役

徐策晨 杨正刚

定陶战役,是我晋冀鲁豫野战军于1946年9月上旬,在鲁西南定陶地区进行的一次成功的运动战。在中央军委直接领导和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的指挥下,我军历经5天作战,取得全歼敌1个整编师部、4个旅共1.7万余人的重大胜利。此役不仅粉碎了国民党军对我晋冀鲁豫解放区的钳击进攻之势,而且扭转了解放区南方战线的被动局面。

掌握敌情,定下决心。1946年6月底,蒋介石在完成军事部署后,公然撕毁停战协定,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同年8月,国民党在陇海战役、同蒲战役失利后,又迅速调集30万兵力,从东西方向向兵分5路直逼鲁西南地区,企图以优势兵力钳击我军主力于陇海路以北定陶、曹县地区,进而占领鲁西南,打通平汉铁路。我军在冀鲁豫战场上仅有4个纵队5万余人,在兵力装备上明显处于劣势。

在敌进攻部队中,国民党整编第3师(以下简称整3师)兵力1.7万,清一色美式装备,是蒋介石嫡系部队中的王牌。其师长赵锡田毕业于黄埔军校,当年初获战功即受蒋介石嘉奖。此役,他认为不需飞机坦克支援,就能把刘邓

赶上太行山。面对来势汹汹的敌军,刘伯承、邓小平审时度势提出,国民党军劳师远征,加之郑州、徐州两个绥靖公署指挥无法实现统一,给我军带来机会。我军虽人困马乏,但胜在士气高昂,有根据地作为依托,且有广大地方武装和人民群众的全力配合与支援。鉴于此,刘伯承和邓小平决心采取“示弱引诱、钳制阻隔、包围歼击”的战法,营造我军战斗力差的假象,有计划地将敌引至我方预定战场,再一举围歼。作战方案上报延安后,得到毛主席的回电肯定。

诱敌深入,灵活应变。根据作战计划,1946年9月2日,战斗打响。我军第6纵队以2个团实施运动防御,边打边退,节节阻击,使敌第3师伤亡1500余人。同时,又安排部分兵力阻击其他各路敌军,将敌第3师和第47师战线距离拉长达十多公里,其余各个方向的敌军也被阻于东明、曹县等地,距敌第3师、第47师的距离最长达100公里,使敌军形成多路阻滞、一路深入、孤军冒进的态势。刘伯承和邓小平决定乘势而为,继续引诱敌第3师,并将主战场由原先的韩集改为大杨湖地区。为把戏做真,负责诱敌的官兵采取故意丢弃

战斗器具、佯装急促溃逃、边打边阻边撤、伺机袭扰相结合的战术,扰敌不宁,使敌第3师师长赵锡田恼怒不已。9月3日下午,我军将整3师引诱至大集、天爷庙、大杨湖地区,赵锡田恃兵强马壮,将师部驻扎在大杨湖不远处的天爷庙。这样一来,敌第3师就与其后的敌第47师完全分离开来,孤立在我军面前。

重点突击,佯攻牵制。着眼有利态势,9月3日23时30分,我军决定采取两翼夹击、避强击弱、重点打击的战术,从东西两面对敌第3师发起攻击,重点攻击战斗力较弱的第20旅,并佯攻和牵制其师部和第3旅。敌第3师负隅抵抗,不敌我军,被歼灭3个营的兵力。5日,刘伯承率部进占陶县西部的沙山寺村第6纵队司令部,专门召开各纵队领导干部紧急会议,决定当晚再度发起全线猛攻,由王近山司令员指挥第6纵队负责攻歼大杨湖,陈锡联司令员指挥第3纵队、杨勇司令员指挥第7纵队攻占附近村寨,陈再道司令员指挥第2纵队在外围阻击来援之敌。经过一夜激战,6日晨,我军全歼敌第20旅,重创第3旅,逼近敌第3师师部。下午,敌第3师残部在飞机、坦克的掩护下向南突围,企图向敌第47师靠

拢,但在运动中被全部歼灭,师长赵锡田被我军俘虏。

乘胜追击,扩大战果。敌第3师被歼灭后,国民党各方向援军见大势已去,纷纷向考城、兰封方向逃窜。刘伯承、邓小平指挥部队向敌第47师、41师、55师、68师勇猛追击,歼敌2个旅、1个团。郑州方向国民党军进攻受挫,徐州方向敌军也被我阻挡在城武地区。至此,定陶战役取得胜利,历时5天,共歼灭国民党军1.7万余人,其中俘敌1.2万余人,缴获坦克及大批军用物资。这次战役打破了敌军的围歼计划,打击了国民党全面进攻的嚣张气焰,提高了晋冀鲁豫解放区党政军民战胜国民党军的信心。

1946年9月12日,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发表了《蒋军必败》的重要社论,文中指出:“这(定陶战役)是继中原我军胜利突围与苏中大捷之后又一次大胜利。这三个胜利,对于整个解放区的南方战线,起了扭转局面的重要作用。”

史说新语

微历史

功勋信鸽“大兵乔”

1943年,英军第56步兵旅奉命对意大利南部的卡尔维里索塔之敌实施突袭。由于未遭遇对手过多抵抗,英军早于原定时间顺利占领这个小村庄。此时突然出现意外情况——英军因携带的电台发生故障,无法与盟军取得联系,而按照原定计划,盟军不久就要对这座村庄进行轰炸以配合地面行动。

紧要关头,英军将希望寄托到一只战地信鸽“大兵乔”的身上。“大兵乔”不辱使命,以时速60公里的速度将信件送回了空军基地。据记载,后方下令取消轰炸该地的任务时,距离执行任务的轰炸机升空仅有短短5分钟。

战后,“大兵乔”被伦敦授予“迪金奖章”,这是英国颁发给动物的最高荣誉。

忠犬之星“斯莫基”

“斯莫基”是一条约克夏梗犬,1944年,美军在新几内亚丛林里发现了它,并将其驯养成军犬。它尤其擅长打结线缆。吕宋岛战役中,由于受到驻岛日军猛烈的炮火压制,美军派“斯莫基”在崎岖不平的地区架设电报线。凭借娴熟的技能,“斯莫基”在几分钟时间内,完成了数倍于人力的工作量。此外,在新几内亚战役期间,“斯莫基”还曾在美军野战医院中工作,并为救治伤员发挥独特作用。

“斯莫基”先后参加过12场战斗,8次荣获“战场之星”勋章,在150次空袭中幸存,被美国陆军《扬克》周刊誉为“西南太平洋战区的冠军吉祥物”。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同盟国和轴心国均使用了大量军犬。它们被广泛应用于前沿侦察、战地通信、战场搜索、警卫营地、防区巡逻、救护伤员、爆破目标、地雷探测等多个方面,立下赫赫战功。

(惠 永)

血洒水道街9号

东北抗联名将李兆麟牺牲始末

■ 郑大壮



李兆麟将军故居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里区兆麟街88号,坐落着李兆麟将军纪念馆。此址曾为水道街9号——1946年3月9日,东北抗联创始人之一李兆麟将军就牺牲于此。

李兆麟原名李超兰,1910年11月生于辽宁省灯塔市后屯村的一户农家。他自幼勤奋,但因家境窘迫,很早便辍学。东北沦陷后,胸怀救国之志的李兆麟走上抗日救亡的道路。1931年11月,李兆麟在北平加入“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在工农中宣传抗日,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奔走于各地,组建义勇军队伍。1933年8月,李兆麟被派往中共满洲省委任军委负责人,后历任珠河反日游击队副队长、东北抗联第六军政治部主任、北满抗日联军总政治部主任、第三路军总指挥、中共滨江省副省长兼中苏友好协会会长等职,率部南征北战,抗击日伪军,为民族解放事业立下了不朽功勋。

抗战胜利后,李兆麟在中共东北局北满分局领导下负责以哈尔滨为核心的北满工作。当时,哈尔滨充斥国民党军统特务和日伪残余势力,局势复杂。李兆麟作为唯一公开身份的我方高级干部,不断揭露和抨击国民党反动派“假和平、真内战、假民主、真独裁”的嘴脸,动员群众奋起斗争。国民党军统多次给他发出恐吓信,扬言要将他“拿下”,许多战友、同事多次提醒他注意人身安全。然而,李兆麟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

1945年9月,国民党军统特务张勃生潜入哈尔滨成立“滨江组”,暗中从事间谍和刺杀行动,并将李兆麟列为“头号目标”。张指派“滨江组”总务科长何士英监视李兆麟行踪,摸索其行

动规律,伺机动手。由于张勃生不久便被苏军秘密逮捕,“暗杀任务”落到何士英和别动队长阎钟璋头上,并得到哈尔滨警察局长何秀豪的支持。行动队前后制定了3种方案,一是让杀手路遇李兆麟开枪,但由于我党对其出行保护十分严密,未能得逞;二是埋伏,军统特务得知李兆麟要去饭店赴约,便提前隐蔽在附近,但当日李兆麟因故未能前往,计划失败;三是派特务潜入哈尔滨中苏友好协会进行刺杀,由于协会戒备森严,也未如所愿。行动队认为,必须要寻找能够接近李兆麟的人,将其单独骗至预定地点实施刺杀。

行动组将行凶地点选在了水道街9号,这里是军统特务的住所,聚集了很多“滨江组”成员,且距李兆麟工作的中苏友好协会很近。同时,何士英收买了在哈尔滨政府中任职的孙格玲,让她伪装成“进步分子”去接触李兆麟,预谋将其诱骗至圈套中。孙格玲遵照行动队的指示设法接近李兆麟,谎称自己是烈士后代,十分憎恨国民党反动派,有机会想邀请他到自家做客,商议“国大”代

表事宜。1946年3月9日下午,李兆麟参加完会议后如约抵达水道街9号。进屋后,孙格玲将下毒的茶水递给毫无防备的李兆麟,当李兆麟发觉情况有异,为时已晚。埋伏在此的多名特务疯狂扑向李兆麟,抢过他口袋里的手枪并挥刀猛刺。李兆麟因寡不敌众,身中7刀,壮烈牺牲。刺杀成功后,特务原计划将其遗体投至江中毁尸灭迹,但由于李兆麟的警卫员及时将其失踪的消息通报给苏军,苏军很快派部队包围了水道街9号一带进行搜查,才找到了李兆麟的遗体。

1946年4月3日,中共中央东北局、东北各界代表近万人,为李兆麟举行了追悼大会,号召民众“继承烈士遗志,为争取东北和平民主奋斗到底”。事件发生后,我党与苏军密切合作,几经周折终于将参与行凶的阎钟璋、高庆三、孟庆云、高喜元、南守善、李剑星等凶手悉数逮捕,让他们得到了正义的审判。

链接历史



太原解放纪念馆